

#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 在黨內排除異己

• 沈志華

**摘要：**蘇軍於1948年底撤離北朝鮮後，朝鮮政權便轉移到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勞動黨手中。當時勞動黨內主要有四個派別，他們之間存在着很大分歧和矛盾。到1956年初，金日成採用嫻熟的政治手段，審時度勢，依次消滅了「南方派」，排擠了「延安派」和「蘇聯派」，而使以他本人為首的「游擊隊派」在黨內佔據了絕對優勢。同時，金日成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塑造其個人英明領袖和國民「父親」的光輝形象，另一方面在蘇聯承認南斯拉夫共產黨自主權的國際大背景下，又不失時機地提出「主體」思想，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重新詮釋了共產主義中的國際主義成份，從而佔領了勞動黨意識形態建設的制高點。對於金日成主導的黨內派系鬥爭，蘇聯全盤了解，但採取謹慎的不干預政策，而中國則漠不關心。這是金日成能夠在短短幾年內逐個擊敗政治對手，掃除黨內各派勢力，將黨政軍大權攬於一身的外部因素。

**關鍵詞：**金日成 朝鮮勞動黨 中朝關係 蘇朝關係 「主體」思想

在當今的國際社會，像北朝鮮這樣的世襲家族統治體制已經極為罕見。人們自然希望了解這一現象的背景和原因，而首先需要釐清的是，金日成究竟是如何走上權力頂峰，在北朝鮮建立起不可動搖且能世代相傳的統治地位。有關這個問題，開拓性的研究應屬美籍韓裔學者徐大肅關於金日成的專著<sup>①</sup>。此外，韓國自1960年代以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以及以口述史料和朝鮮公開出版物為主要依據的相關著作，但囿於當時的條件，基本沒有使用檔案文獻，很多說法和判斷難以取信<sup>②</sup>。冷戰結束後，隨着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檔案的解密，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了新進展，重點在於從蘇朝關係的角度進行闡釋<sup>③</sup>。但迄今為止，這方面的學術研究還存在兩個明顯的缺憾：一是近幾

年來披露的一批重要俄國檔案較少得到利用，特別是關於1956年9月中蘇共同干預朝鮮事務的文件；二是較少涉及中國因素<sup>④</sup>。事實上，在1950年代對北朝鮮影響最大的國家，已從蘇聯轉到了中國。

筆者在寫作中朝關係史的過程中，收集了大量俄國和中國的相關檔案文獻，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仔細梳理，大體勾畫出金日成自1949年開始親政到1958年獨掌黨政軍大權的歷史過程<sup>⑤</sup>。本文主要論述金日成走向權力頂峰的第一步：在黨內排除異己力量的過程。

1948年底蘇軍全部撤出北朝鮮時，把權力交給了作為核心領導人的金日成，但蘇軍協助他組建的朝鮮勞動黨（簡稱勞動黨）則是由許多派別聯合而成的<sup>⑥</sup>。這個黨裏主要有金日成領導的出身東北抗聯部隊的「游擊隊派」（滿洲派），以朴憲永為核心的「南方派」（南朝鮮勞動黨〔南勞黨〕派），以金料奉和武亭為首的「延安派」，還有雖未形成派別但以許嘉誼（許哥而）為代表人物的蘇籍朝鮮人（一般稱「蘇聯派」或「莫斯科派」），而原來曾存在的國內其他派別（如「甲山派」等）在勞動黨成立時基本上已銷聲匿迹。這幾個主要派別的幹部之間，背景差別甚大。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游擊隊派來自蘇聯遠東和中國東北，延安派來自中國西北和華北，蘇聯派來自蘇聯中亞，而南方派則來自朝鮮半島南部地區。他們有着不同的經歷和出身：游擊隊派主要是農民，延安派大多是軍人，蘇聯派主要是文職人員，南方派則以職業革命家較多。他們甚至連語言習慣也有所不同：延安派比較熟悉中文，蘇聯派更願意講俄文，游擊隊派和南方派雖都用朝鮮語，但也有南北之別。

這樣一些人集合在一起，又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領袖人物，再加上朝鮮共產黨派系鬥爭的傳統，很難想像他們能夠攥成一股繩<sup>⑦</sup>。1950年9月，美軍成功登陸仁川導致的軍事失敗，使得金日成的威信和影響力大為降低，其領導地位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戰。金要在黨內和國內取得絕對統治地位，樹立起個人的絕對權威，就必須逐一消滅這些派別。

## 一 朴憲永和南方派全軍覆沒

在勞動黨內真正具有能力可以向金日成領袖地位提出挑戰的，只有朴憲永及其南勞黨，但最缺少國外背景的也是這些人。朴在蘇聯接受教育，出身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又在日本投降後最早重建朝鮮共產黨，的確被莫斯科看重，甚至一度考慮讓他成為核心人物。但是朝鮮南北分裂的局面導致朴的勢力和影響大不如前，最後被迫逃往北方，只能寄人籬下，憑藉其個人影響和威望，屈居勞動黨第二把手。南方派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取代金日成在朝鮮的領導地位，金發動的韓戰遭到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對於金來說，朴是最危險的人物，但由於其沒有後台，因此也是最容易對付的派別。於是，金在黨內清除異己就先拿朴和南方派開刀了。

從檔案文獻可以看出，金日成與朴憲永之間的分歧早就存在。如1949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金進攻南方的「甕津半島作戰計劃」。10月4日，蘇聯大使向朝鮮領導人傳達莫斯科的旨意時，金勉強接受，無奈地說了一聲

「好吧」，而朴則講得比較明確：「這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更廣泛地在南方開展游擊運動。」<sup>⑧</sup>又如翌年9月美國軍隊在仁川成功登陸後，中國明確向朝鮮和蘇聯表示，可以出兵援助朝鮮。在9月20日勞動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是否邀請中國出兵時，金看到蘇聯大使還是像以前一樣對這個問題不置可否，知道斯大林當時還沒有這種意願，便發言說中國軍隊來了也解決不了問題。當時會議上所有人都隨聲附和，只有朴堅持應該立即請中國出兵<sup>⑨</sup>。

金日成和朴憲永的分歧隨着戰事失利以及中國出兵後金的軍事指揮權被剝奪而加劇，並且逐步公開化。1951年7月兩韓停戰談判開始以後，金愈來愈傾向於盡快停戰，以便恢復北方的秩序和經濟建設。在8月14日平壤慶祝朝鮮解放六周年的群眾大會上，金反覆談到停戰的必要性，在講話中不斷反問：「為甚麼不能同意他們〔美國人〕的建議呢？」、「為甚麼不能同意停戰的建議呢？」<sup>⑩</sup>這話實際上就是衝着朴說的。朴和南勞黨一派完全不能接受停戰，因為他們的家鄉和根基都在南方。在金講演後一個月，9月15日，朴在接見來訪的越南代表團時強調說：「朝鮮人民要繼續英勇奮鬥，一直到在我們土地上把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全部消滅並徹底驅逐出去。」1952年1月25日，朴又在平壤召開的全國農民積極份子大會上發表演說：「任何國家的人民為了自己的主權和獨立都不能不進行流血戰爭，如果不對侵略者展開有系統的抵抗鬥爭，那就只能成為奴隸，走為侵略者服務的一條路了。因此，為了取得勝利，我們要不怕任何犧牲，從現在開始計劃展開持久戰。」<sup>⑪</sup>所謂「持久戰」，是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想法，而金心裏是不願意接受的。

到1952年夏天，金日成要求停戰的心情更加急迫，他甚至要求中國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不要在戰俘的問題上糾纏不休，還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後，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了在停戰問題上意見對立且相持不下的中朝雙方代表，包括周恩來、彭德懷、高崗和金日成等人，並表明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sup>⑫</sup>。金垂頭喪氣地回到平壤後，卻聽到朴憲永顯然是支持蘇聯和中國立場的演說。在1952年11月發表的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報告中，朴號召朝鮮人民「要充分地将自己武裝起來」，「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今後要長期地激烈地進行下去」。不僅如此，在講述朝鮮抗日獨立運動時，朴一再強調朝鮮共產黨的「主導作用」，而對金的影響卻隻字未提，甚至沒有提到他的名字<sup>⑬</sup>。朴是朝鮮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而金那時連黨員都不是。朴敢於如此公開地與金唱對台戲，一方面是根本沒把金看在眼裏，另一方面顯然是希望依靠莫斯科和北京向金施加壓力。面對如此明顯的蔑視和挑戰，金決心痛下殺手。

1952年12月15日，金日成在勞動黨第五次中央全會作報告，提出了與宗派主義殘餘勢力作堅決鬥爭的問題。報告不無所指地列舉了一系列宗派主義殘餘的表現，要求所有黨員都必須加強黨性，「對黨無限忠誠」，並提高警惕，嚴密監視宗派份子，使他們在黨內「寸步難行」<sup>⑭</sup>。在大造輿論的同時，金指使蘇籍朝鮮幹部朴昌玉秘密調查南勞黨幹部的宗派傾向和不滿情緒，開始收集和製造朴憲永一派的罪證材料<sup>⑮</sup>。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一批南方派幹部突然陸續被捕。7月30日，即《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後第三天，根據朝鮮刑法第二十五條，以叛國罪對南勞黨李承燁等十二人提起公訴。8月3日，

最高裁判所開庭審理，6日審判結束。被控犯罪人的罪名有三項：為美國進行間諜活動、瘋狂破壞和鎮壓南朝鮮民主人士和革命力量、試圖以武力顛覆共和國政府。被判刑的還有文化宣傳省副相趙一明、朝蘇文化協會中央副委員長林和、京畿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朴勝源、勞動黨中央聯絡部部長裴哲以及副部長尹淳達等。起訴書詳細列舉了犯罪「事實」，結果十人被判處死刑，二人被判處十二和十五年有期徒刑<sup>⑥</sup>。此外，8月5至9日，勞動黨召開二屆六中全會，宣布了以李為首的反黨叛國間諜集團的罪狀，並通過決議，撤銷反黨叛國份子、破壞暗害份子、宗派份子朴憲永、朱寧河、張時雨等七人的中央委員職務，開除出黨；撤銷權五稷的中央候補委員職務，開除出黨；撤銷具載洙等四人的中央委員職務<sup>⑦</sup>。至此，南勞黨一派幾乎被一網打盡。但金為了徹底鏟除南方派的勢力及其影響，還必須致朴於死地。

李承燁是追隨朴憲永的南勞黨骨幹，1949年9月南、北勞動黨合併時，朴當選為中央副委員長，李當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50年12月，李晉升為勞動黨中央書記處第二書記<sup>⑧</sup>。「李承燁反黨叛國間諜集團事件」無疑是整肅朴的先聲和鋪墊，當時對於被判處死刑的人沒有立即行刑，就是為了羅織朴的罪名。不過，要徹底消滅像朴這樣頗有名望的老一代革命家，並非易事。1953年11月，金日成訪華期間在與毛澤東談話時曾問道，關於朴叛變的證據並不充分，如何處理為好。毛回答說，朴是個文人，不像貝利亞(Л. П. Берия)殺了很多人，如果將來證明他不是反革命，可以恢復名譽；如果確實是反革命，關起來就是了，但「無論如何不能殺掉」。後來蘇聯得知此事，也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朝鮮的顧問向金提出建議，不要殺朴<sup>⑨</sup>。但過了兩年多，朴還是在1955年12月3日被起訴，罪名與李等人完全一樣。12月15日上午對朴進行審判，晚上8點就宣讀了判決：死刑。朴拒絕了為其指定的律師，在審判中也承認了所有強加的罪名，只是對發動政變一事堅持並不知情，但願意為其屬下的行為負責<sup>⑩</sup>。

在勞動黨內的幾個派別中，南方派是最抱團的，朴憲永的凝聚力也比較強，尤其是在佔領南朝鮮的幾個月裏，勢力大有增長。李承燁就是重組南勞黨的總負責人，並兼任漢城市市長，還在那裏創建了政治學院，培養幹部和游擊隊指揮員，甚至招募武裝力量。因此，很多韓國學者認為指控他們的罪名大都是無中生有，但組織推翻金日成的行動很可能是存在的，儘管起訴書中敘述的詳細計劃令人難以置信<sup>⑪</sup>。不過，南方派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其他各派的支持，金反而利用了蘇籍朝鮮人來對付朴。南方派的覆滅為金掃除了通向權力頂峰的最大障礙，但最高人民議會主席團批准朴的死刑判決被推遲執行了<sup>⑫</sup>——原因很簡單，金還需要用他的證詞來扳倒其他派系的領導人。

## 二 延安派和蘇聯派受到排擠

延安派的情況最有意思。他們當中有很多非常出眾的幹部，資歷深、能力強。金科奉、崔昌益、韓斌、李相朝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而武亭、朴

一禹、金雄、方虎山都是能征善戰的軍事幹部。但是從整體的角度看，實力卻顯得十分薄弱，他們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各行其是。如延安派主要幹部回國後，金料奉重建朝鮮獨立同盟時，武亭和崔昌益都沒有參加，而是加入了北朝鮮共產黨。後來延安派組建新民黨，崔昌益轉過來任副委員長，而作為第三書記的武亭仍留在共產黨北方分局<sup>23</sup>。

金料奉是延安派的第一號人物，早年加入朝鮮共產黨，後棄政從學，1942年被中共請到延安，當了朝鮮獨立同盟主席。但此人沒有政治抱負，為人小心謹慎，與世無爭。毛澤東和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議論起來，都認為他是個「好人」，「有學問」，「政治上很穩當」。他回國後曾想到中國走一走，但金日成不同意，就沒有成行<sup>24</sup>。金料奉充其量算是延安派的一個精神領袖，在政治上沒有發揮實際作用，金日成對他也不在意。對金日成構成直接威脅的主要是其他軍事幹部。

第二號人物武亭就不同了，為人脾氣暴躁，爭強好勝，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武亭資格很老，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紅軍長征，後來擔任朝鮮義勇軍司令。1941年10月，延安召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他的畫像與毛澤東的畫像一同掛在主席台上<sup>25</sup>。顯然，如果得到中國在背後的支持，武亭會是金日成最具威脅性的對手。因此，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金首先找藉口除掉的就是這個人。1950年12月21至23日，勞動黨在江界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金在會上嚴厲地批評黨政軍各級幹部，說他們對帝國主義干涉的困難估計不足，在敵人攻勢面前失去指揮能力，擅離職守，紀律渙散。會議對一大批「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進行了處分，或撤職查辦，或開除出黨。武亭便在其中，不僅被撤銷了第二軍團司令官的職務，還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金在會上指責他在保衛平壤作戰中指揮失職，防守不力<sup>26</sup>。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金委過於人，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下屬(如與武亭一起被撤職的還有金的游擊隊戰友金一、崔光、林春秋，以及蘇聯派的金烈，國內派的許成澤、朴光熙等)，而是不久以後，這些人幾乎都官復原職或再次獲任用，只有武亭一人徹底成了「老百姓」<sup>27</sup>。其後，在彭德懷以個人名義要求下，武亭赴中國治療胃病，但1951年6月又被金召回，不久便去世了<sup>28</sup>。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金日成對延安派軍事幹部的確加強了戒心和防範<sup>29</sup>。其他幾個重要的延安派軍事幹部雖未被撤職，但也調離了重要崗位。如方虎山因在作戰方案上主張採用中國解放軍的打法，與金意見不合，於是被撤銷軍團長一職，改任軍事學院院長。又如金雄雖升任民族保衛省副相，但實權被剝奪，其人民軍前線司令部司令官的職務由金光俠接替，中朝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員的職務也改由崔庸健接替<sup>30</sup>。

剩下一個比較麻煩的人物就是朴一禹。朴與中共的關係極為密切，曾作為正式代表(王巍)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在大會發言。這一點本來是他的優勢，金日成請求中國出兵援助的親筆信就是朴送到北京的，後來到瀋陽催促中國盡快發兵的也是他，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擔任兩軍之間聯絡官的還是他。但是，中朝聯合司令部成立後，朴以內閣內務相的職務兼任中朝聯軍的政治委員，整天和彭德懷在一起，就令金感到不安了。1951年

3月，金先設立了社會安全省，把原來內務省的核心業務分離出來。隨後在1952年10月又改任朴為遞信相，進一步削弱他的權力<sup>①</sup>。金給朴保留內閣職位，完全是因為朴在軍隊中的威望太高，同時也顧及到他與中方的密切關係<sup>②</sup>。但事情並沒有完結。12月15日，在勞動黨中央全會上，金以批判官僚主義為題，開始不點名地把矛頭指向朴。金說官僚主義助長了部分人在工作中自高自大和虛飾、諂媚的傾向，甚至由於官僚主義的典型表現——個人英雄主義作怪，竟然出現了想以「自己的路線」代替黨中央路線的現象<sup>③</sup>。不久以後，1953年2月5日，金便通知中朝聯合司令部，朴被召回，其政治委員的工作由崔庸健兼管<sup>④</sup>。但是，朴繼續與志願軍保持着聯繫，並通報消息。1954年朝鮮糧食短缺，因饑荒餓死幾百人，朴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中方。金得到朴金喆（原甲山派幹部）的密報後十分惱怒，對朴一禹破口大罵<sup>⑤</sup>。

金日成對朴一禹及其他延安派軍事幹部的公開批判是在1955年4月開始的。在4月1至4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上，金使用激烈的言辭，點名批判了以朴一禹、金雄和方虎山為首的「前中共黨員小集團」，說朴以「來自中國的代表自居」，拉幫結派，陰謀分裂黨。朴聲稱自己是毛澤東委派到中朝聯合司令部工作的，然其行為似乎不取決於朝鮮的軍事指導方針，尤其是不取決於金。此外，金指責這個小集團還企圖把蘇聯軍事專家的工作和中國軍事指揮作比較，以敗壞蘇聯軍事專家的名聲<sup>⑥</sup>。儘管金在會上表示，「應該給朴一禹及其同夥提供最後一次放下武器，在工作中和觀點上站到正確立場上來的機會」，但實際上，幾個月後朴和金雄便被軟禁起來，方虎山也遭到了清洗<sup>⑦</sup>。

八個月以後，金日成給了朴一禹最後一擊。1955年12月2至3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做出決議，將朴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並撤銷其黨籍。根據金在講話中羅列的罪行，給朴確定的罪名是：「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誹謗」，在來自中國的幹部中拉幫結派，與朴憲永、李承燁反黨判國間諜集團建立「反黨統一戰線」，生活腐化，揮霍浪費，等等<sup>⑧</sup>。12月15日，朴正式被捕，金開始搜集他與朴憲永、李承燁集團勾結的證據，還讓朴憲永出來作證；但後者只證實了一點：「朴一禹將朝鮮人民軍在1950年向北方撤退看作是軍隊領導無能所造成的失敗。」1956年3月，蘇聯駐朝大使向莫斯科報告了朴被捕的情況並指出，金日成尚未找到朴犯罪的任何證據<sup>⑨</sup>。同年5月，金日成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宣布，對朴調查的結果還無法確定其所犯罪行的具體內容<sup>⑩</sup>。儘管如此，延安派作為一個「派別」已遭到毀滅性打擊，雖然還有一些政治幹部（金料奉、崔昌益等）以個人身份留在領導崗位。金排擠延安派幹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軍權。在中朝聯合司令部成立、金被剝奪軍事指揮權以後，他最擔心的就是在朝鮮人民軍中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延安派幹部，因為他們與中方的關係太密切，很可能影響金對朝鮮軍隊的控制，甚至威脅到他的整個權力。朴等一批延安派幹部的職務，後來大多被那些與中方較少接觸的游擊隊派和蘇聯派幹部接替了。

另一方面，蘇聯派幹部都來自蘇聯不同的單位，相互之間過去也沒有甚麼聯繫，其實根本說不上是一個派別，而且他們與南方派和延安派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即蘇籍朝鮮幹部從來沒有成立過甚麼團體或政黨。來到朝鮮以

後，許嘉誼因名氣大而成為蘇聯派的中心人物。許性情豪爽，為人固執，在蘇聯時當過州委書記，是第二代蘇籍朝鮮人中最有名望的政治人物之一<sup>④</sup>。因此，在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黨成立時，許就擔任了副委員長。1949年9月南、北勞動黨合併時，又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sup>⑤</sup>，許在黨內的排名僅次於金日成、金科奉、朴憲永。許負責組織工作，他與金日成的分歧和矛盾也由此產生。

金日成對許嘉誼的不滿主要在於黨組織建設和發展的兩個方面：第一，在美軍登陸仁川而朝鮮人民軍北撤時，很多黨員把黨證毀掉或藏起來，這成為後來許在重新恢復黨組織時進行嚴厲懲罰的理由——很多人因為拿不出黨證而被認為有通敵嫌疑。如受到處罰的黨員中，有80至85%就僅僅是因為沒有舊黨證；第二，在發展新黨員時，許按照蘇聯的做法，特別強調工人成份，而對大多數農民根本不放在眼裏，如規定平安北道博川郡每月只給十七個農民黨員的名額。金對此十分不滿，並提出嚴厲批評，但許不以為然，陽奉陰違。在1951年11月1至4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上，金集中批評了黨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問題，許因而被撤銷中央書記的職務，降到農業省任副相。1952年初，金又派遣許去負責順安水庫的修復工程。性情高傲的許對此憤憤不平，遂對金的強迫徵糧政策提出批評。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sup>⑥</sup>。在前述1953年8月5至9日勞動黨二屆六中全會揭露李承燁反黨叛國間諜集團的同時，宣布了許自殺身亡的消息<sup>⑦</sup>。

金日成整肅許嘉誼主要還是針對個人行為，而非要清除來自蘇聯的幹部，他甚至利用了蘇籍朝鮮人之間的矛盾（如朴昌玉就對許嘉誼很不服氣）<sup>⑧</sup>。與對延安派的幹部不同，就個人來講，金當時對蘇籍朝鮮幹部並沒有太大的不滿。1951年11月中央全會宣布許被撤銷黨內職務時，為了安撫蘇聯派以及堵住蘇聯人的嘴，金安排接替許職務的還是蘇籍朝鮮人：朴昌玉出任中央委員會書記、朴永彬出任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1953年8月，朴昌玉、朴永彬、金承化、南日等蘇籍朝鮮人均成為新建立的中央常委會成員，而朴昌玉則成為五人政治委員會委員之一，排名第四。1954年3月，金為加強戰後經濟重建工作而改組了內閣，朴昌玉改任內閣副首相兼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朴永彬則被增補為政治委員會委員<sup>⑨</sup>。

然而，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勞動黨內突然開展了一場針對蘇籍朝鮮幹部的大批判。對於金日成來說，權力必須集中。打擊朴一禹等延安派幹部，重點在於奪回軍權，而扳倒許嘉誼則是要奪回組織和宣傳領域的權力。朴昌玉和朴永彬接管的就是這兩個方面的工作。但恰恰在這兩方面，金與蘇聯派幹部開始發生了分歧和衝突。

關於組織問題，第一次分歧發生在1955年4月。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黨內在「個人崇拜」方面的宣傳便逐步降溫，並開始限制個人權力的膨脹。1955年1月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被撤銷部長會議主席的理由之一，就是要貫徹集體領導的方針<sup>⑩</sup>。金日成當時就像斯大林和馬林科夫一樣，身兼黨和政府的第一把手。聰明的金看到蘇聯的情況便想到了朝鮮，他必須精心安排，防患於未然。4月中央全會前，朴昌玉和金科奉提出金日成工作量太大，可以考

慮解除他的一些職務。金「高興地」表示接受，但希望過一段時間再提出這個問題。與此同時，金在抗聯老戰友崔庸健主動申請辭去了民主黨委員長的職務，接着在中央政治委員會討論幹部任用問題時，金就提出增補崔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委員會成員。這一建議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朴昌玉和朴正愛公開表示反對，其他人沉默不語。實際上，除朴金喆外，所有委員都不同意。然而，金在不久後召開的4月中央全會上，還是提出了這個建議，並得到一致通過。崔進入政治委員會以後，金便在9月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上主動提出要辭去首相的職務，並認為接替這一職務最合適的人選就是已經成為政治委員會委員的崔。朴昌玉、朴永彬和朴正愛又提出反對意見，主要理由是崔能力太差，不堪勝任。金的建議因遭到多數人反對而作罷。然而，在12月的中央全會上，在金的努力下，崔庸健和朴金喆雙雙成為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其實，金完全了解崔的能力。就在1955年1月，由於崔工作不力，金建議將朴昌玉調入由崔負責的國防問題委員會<sup>④</sup>。但只要一個人表現出忠誠，金就需要把他安排在關鍵崗位。此後，崔便成為金的副手，直到終老。1955年崔未能做成首相，而金對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信任大概也就此終結。在這種情況下，二朴大量提拔蘇籍朝鮮幹部，又對許嘉誼被指控為「人民的敵人」有看法，這自然就會引起金的反感和警惕。後來批判朴昌玉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搞宗派活動，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到思想工作的重要崗位，如奇石福、鄭律、鄭東燮等人，而「這些人都是與他一起在蘇聯生活和學習過的老同學」<sup>⑤</sup>。

在宣傳工作方面，朴昌玉和朴永彬的主要問題是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提出了不同意見，多次指出思想宣傳方面存在過於突出個人的「方向性錯誤」。1955年2月朴永彬改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後，曾在政治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在出版物中應注意闡述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問題。金表示同意這個建議，朴信以為真，便在隨後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金的指示。朴訪蘇回國後，根據和平共處的方針，提出在報刊上改變一下反美宣傳的論調。金沒有同意這個建議，但朴的助手已經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了這種想法<sup>⑥</sup>。這些情況自然引起金的極大不滿，後來二朴受到批判的另一個罪狀就是「不允許黨和人民向他們的領袖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態度」<sup>⑦</sup>。

朴昌玉擔任內閣副首相及國家計委會委員長以後，在經濟工作領域又與金日成產生了分歧。1954年10至11月政治委員會討論糧食收購的問題時，朴昌玉和朴永彬提出可以仿效蘇聯的通常做法，由消費合作社按照自願的原則向農民收購，但金堅持必須制訂徵購計劃和確定指標。1955年2月，中央常委會被迫取消強迫徵購，並決定給予農民一定補償，但錯誤的責任還是要國家計委會和農業省來承擔。此外，朴昌玉及蘇聯派的理論工作者在國民經濟計劃投資比例方面，沒有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主張加快發展消費工作；在合作化運動中，反對大規模、高速度發展合作社，而提出應像蘇聯那樣先實行機械化，這些都違背了金的旨意<sup>⑧</sup>。

於是，一場清洗以朴昌玉、朴永彬為首的蘇籍朝鮮幹部的政治運動隨之開始<sup>⑨</sup>。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1955年12月2至3日召開了勞動黨中央全會。儘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農業問題和召開勞動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事



宜，儘管宣布開除朴一禹黨籍和進一步消除許嘉誼的影響是解決「組織問題」的主要目的，但全會也為批判蘇籍朝鮮幹部進行了充分的輿論準備。在關於組織問題的發言中，金日成先是全面攻擊朴一禹和許嘉誼，後來卻突然大講特講起文學工作中的錯誤傾向，點名批評朴永彬，指責他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延續許的工作作風，並用激烈的言辭，尖銳地指責奇石福、鄭律、鄭東燮等蘇籍朝鮮幹部，說他們吹捧與李承燁反黨叛國間諜集團有瓜葛的南方派作家李俊泰等人，而貶低和排擠北方無產階級文學家韓雪野、李箕永。金在講話中反覆發問：難道對來自蘇聯的朝鮮幹部就不能批評嗎？會議宣布免除朴永彬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同時批准崔庸健和朴金喆為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林海為監察委員會委員長，韓相斗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孝淳為中央幹部部部長，李一卿為中央宣傳部部長<sup>54</sup>。會後，金派南日去蘇聯使館匯報，說這些蘇籍朝鮮幹部身居高位，脫離群眾，自我封閉，與當地幹部的矛盾已經激化。還說朴昌玉高高在上，作風粗暴，「許多幹部開始憎恨他」，而朴永彬則是一個「卑鄙小人」。南日甚至暗示說奇石福、鄭律、鄭東燮等人有陰謀活動，似乎朴昌玉也牽涉其中<sup>55</sup>。

在一系列的鋪墊工作完成以後，12月27日召開了勞動黨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出席者超過四百人。會議集中批判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在文學領域執行的「反黨路線」，林海、韓雪野更聲稱掌握了這些蘇籍朝鮮幹部搞宗派活動的材料，金日成則在發言中具體地提到了十五個許嘉誼的追隨者。會議根據金的提議，將朴昌玉開除出政治委員會，鑒於他在與朴憲永的鬥爭中表現不錯，獲保留中央委員和副首相職務，以觀後效；將朴永彬開除出政治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將奇石福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委託監察委員會對奇石福、鄭律等人的問題立案審查<sup>56</sup>。蘇聯派的主要幹部至此也全部被清除出領導核心。

總之，到1955年12月底，在徹底地消滅了南方派、扳倒了延安派和蘇聯派的主要領導人物以後，金日成成功地把黨、政、軍大權逐一掌握到自己手中。但事情還沒有結束。金以批判宗派主義為由，相繼將來自南方的、中國的和蘇聯的主要領導幹部打倒，而唯一沒有受到衝擊的就是多年追隨他的游擊隊派幹部，這不會不招來非議。為了穩定局面、爭取人心，他必須對自己的這種行為做出合理、合法的解釋。

### 三 金日成提出確立「主體」思想

金日成能夠在政治鬥爭中節節勝利，當然離不開使用政治手腕。如上所述，他充分利用了黨內個人之間的矛盾、各派之間的分歧，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金經常親自找被打擊的對象談話，一方面進行安撫，另一方面巧妙地把責任推給其他人。他甚至對打擊對象也是區別對待，如在組織批判朴昌玉和朴永彬時，金就採取了威逼後者首先認罪，再集中力量打倒陷入孤立境地的前者的手段<sup>57</sup>。金深諳此道，但並不僅僅如此，他是一個有政治智慧的

人。他知道在勞動黨內各派幹部力量大體平衡的情況下，要想取得最高和全部權力，首先需要樹立個人權威，讓全黨信服。

權威的建立是從講述領袖生平和歷史作用開始的。早在1946至1947年，金日成就曾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向新聞、文化和學術部門的工作人員詳細介紹自己的生平，並直接要求他們創作與此相關的文章和作品<sup>⑧</sup>。1952年4月15日在金四十歲生日之際，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增加特刊，刊登了《金日成將軍傳略》<sup>⑨</sup>。朝鮮戰爭剛剛結束，朝鮮政府便派出「金日成元帥抗日戰績調查團」到中國東北收集金的相關資料<sup>⑩</sup>。不久，金便成為朝鮮抗日鬥爭中最著名的甚至是唯一的英明領袖。他的出生地萬景台和曾戰鬥過的普天堡分別建立了金日成紀念館，朝鮮人民解放鬥爭博物館也變成了以金日成命名的博物館<sup>⑪</sup>。1955年3月，電影院開始放映一部謳歌金偉大功績的紀錄片《金日成元帥在各地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鬥爭》。後來《勞動新聞》盛讚說，這部影片對勞動人民「了解革命傳統具有巨大的教育意義」。在朝鮮的報刊上和課堂上，金成為「朝中兩國的優秀兒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導者；「作為天才的馬列主義宣傳家和反日游擊鬥爭的組織者」，金「領導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者的鬥爭」；「朝鮮是被金日成所率領的游擊隊解放的」；在1950至1953年的「祖國解放戰爭」中，金也是「所有戰役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所有勝利「都是金日成元帥英明領導的結果」<sup>⑫</sup>。

於是，在朝鮮全國掀起了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在報刊、電影、文學作品、教科書中，金的名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很多大學、街道和廣場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年輕的金被稱為朝鮮人民的「父親」；他隨口說出的一句話都會成為黨的口號，如「大米就是社會主義」或「紡織是藝術」之類。在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頭腦中，「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量都是領袖人物、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因為在朝鮮，「一切問題都由金日成一人決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很多人因對領袖不敬而身陷囹圄。有人因為用印有金畫像的雜誌封面包書皮而入獄五年，還有一名備受徵糧之苦的農民指着金的畫像說了一聲：「您不了解人民的狀況，只知道折磨人」，結果被判刑七年<sup>⑬</sup>。金在勞動黨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可動搖，收拾黨內反對派自然會馬到功成。

然而這還不夠。朴憲永、李承燁被打成反黨叛國間諜集團，雖證據不足（甚至可能是捏造的），但畢竟經過了法律程序，大家無話可說。而大批延安派幹部和蘇籍朝鮮幹部被整肅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究竟有甚麼罪過？難道僅僅因為與金日成意見不合或有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問題就被打倒？因此，要使全黨信服，金不僅要佔領輿論制高點、道德制高點，還必須掌握理論的制高點——這一點在崇尚意識形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說，金必須證明這些人在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上犯有嚴重錯誤，背離或反對黨的正確路線，因此他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的行為都是反黨行為。

1955年12月28日，即中央常委會宣布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蘇籍朝鮮幹部的錯誤並做出處理決定的第二天，金日成發表了關於宣傳鼓動工作的長篇講話，這篇講話正式公布時定名為〈關於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確立主體〉<sup>⑭</sup>。正如有些學者注意到的，「主體」（Chuch'e/Juche）這個名詞

並不是金發明的，而且在朝鮮的宣傳中，很長一個時期並沒有突出這一概念<sup>⑥</sup>。金再次提出「主體」的概念，是在1961年11月勞動黨四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但也只是出現了一次<sup>⑦</sup>。1962年12月19日《勞動新聞》發表編輯部文章，紀念1952年12月五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重點介紹並解釋了金的「主體」思想<sup>⑧</sup>。「主體」真正成為勞動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的核心及代名詞，並作為朝鮮黨和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已經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

不過，無論如何應該看到，金日成的確在批判「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即自主性。在斯大林主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國際主義」已成為經典，為各國共產黨所接受。這個概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普及，把蘇聯和蘇聯黨的利益就是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一現象合理化了。國際主義的對立面是民族主義，凡是違背莫斯科旨意、侵害蘇聯利益的行為都被指責為「民族主義」。那時，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敢於公開強調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特點及利益。1948年鐵托(Josip B. Tito)被革出教門的罪名就是「民族主義」，1949至1952年東歐各國共產黨中的本土派幹部遭到清洗，也被指責犯有「民族主義」錯誤，而中國共產黨為了表明自己對斯大林路線的支持，早在1948年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sup>⑨</sup>。如今，斯大林去世了，而蘇共新領導人又在給個人崇拜降溫，並提倡民主，減少對東歐國家的干預<sup>⑩</sup>。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恐怕就是蘇聯與南斯拉夫修復關係以及1955年5至6月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當面向鐵托負荊請罪了<sup>⑪</sup>。金不失時機地提出「主體」或「自主」的思想，說明他不僅問題看得準，而且時機把握得好。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民族主義，就是要突出朝鮮民族的文化特徵、歷史傳統及國家利益。而抓住這個問題，恰恰就找到了那些來自中國和蘇聯的朝鮮幹部的致命弱點。

金日成在1955年12月的長篇講話一開始就指出，「沒有主體，這是思想工作中的最主要的缺點」，「沒有很好地確立主體」，「這是嚴重的問題」。甚麼是「主體」？金明確地提出，「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因此，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我們研究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其目的是要正確地進行我國的革命。」在指出一系列忽視朝鮮歷史、漠視朝鮮特點、一味模仿國外(尤其是蘇聯)的現象後，金嚴厲地點名批判了蘇聯派和延安派幹部：「朴永彬訪問蘇聯後回來說，蘇聯執行的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方針，我們也應當放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這種主張同革命的創造精神毫無共同之處。」「朴昌玉因為不研究我國的歷史和我們的現實，所以在思想上和資產階級的反動作家李泰俊勾結在一起了。……他在思想工作中所犯的罪過，是很嚴重的。」「在戰爭時期，許嘉誼、金載旭和朴一禹等人對軍隊內政治工作的方法問題進行了一場無聊的爭吵。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則主張學中國的方法。他們彼此爭吵不休，這個說蘇聯的方式好，那個說中國的方式好。這種爭吵是毫無意義的。」金認為，「在工作中，重要的是領會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重要的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一定要按照蘇聯的方式去做的原則是不能成立的。儘管有些人說蘇聯的

方式好，或者中國的方式好，可是現在不是已經到了應該創造出我們自己的方式的時候了嗎？」「如果忽視我國的歷史和我國人民的傳統，不考慮我們的現實和我國人民的覺悟程度，而機械地搬用人家的經驗，就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這不是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是忠於國際主義，相反地，是和它們背道而馳的。」<sup>①</sup>

最後，金日成針對國際共運的傳統理論「國際主義」講了一段話<sup>②</sup>：

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是不能分割的。要認識到：朝鮮的共產主義者熱愛我們的國家，不但不違背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且是和國際主義完全一致的。熱愛朝鮮，就等於熱愛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同樣，熱愛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就意味着熱愛朝鮮。這是完全統一的。因為工人階級的事業是沒有國界的，我們的革命事業是世界工人階級國際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各國工人階級的唯一最高目標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如果說有差異，那只是有的國家走在前面，有的國家走在後面。

他的結論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就是國際主義者，同樣，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就是愛國主義者。」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邏輯鏈條：「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於是，金的「主體」概念和「自主」思想便自然地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那些死抱着蘇聯或中國經驗不放手的教條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也就自然地變成了反馬克思主義者。

正是做了充分的理論鋪墊之後，1956年1月18日，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與文學和藝術領域裏的反動資產階級派別思想鬥爭〉的決議，正式公布了對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的處分決定，並發給全黨各基層組織討論。決議和金日成在會上的發言均指控這些人進行反黨派別活動，有系統地反對黨的政策，並把他們的錯誤與朴憲永、李承燁的反黨叛國間諜集團聯繫在一起<sup>③</sup>。此時，金唯一擔心的是蘇聯的反應，因為這些人畢竟是從蘇聯派遣回國的，而且還享有蘇聯國籍<sup>④</sup>。

為了釋除蘇聯方面對於清洗蘇籍朝鮮幹部的疑慮，首先，金日成要讓蘇聯人知道，針對蘇籍朝鮮幹部的過份行動與他本人無關。通過經常與蘇聯使館接觸的朴義琬、金承化等蘇籍朝鮮幹部，蘇聯使館得到的信息是，很多重要幹部要求審查朴昌玉等人的問題，金「起先盡量頂住，後來才決定進行審查」；到發現有些幹部（崔昌益、林海、韓相斗等）不能正確領會金在1955年12月中央全會擴大會議的講話精神，錯誤地對待蘇籍朝鮮幹部以後，金日成才嚴厲地批評了他們<sup>⑤</sup>。其次，金對多數蘇籍朝鮮幹部採取了安撫政策。通過朴義琬之口，金讓蘇聯人了解到，針對有些領導幹部在對待蘇籍朝鮮公民問題上的錯誤做法，他在政治委員會上建議召開蘇籍朝鮮公民的專門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幹部會議，研究並解決問題。這些會議召開以後，情況已經有所好轉<sup>⑥</sup>。

更重要的是，金日成要把處理這些蘇籍朝鮮公民的事情合法化，也就是說，需要他們加入朝鮮國籍。於是，金向蘇聯政府提出了「解決關於各個時期

從蘇聯回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行長期工作的蘇籍朝鮮公民的國籍問題」。根據他的要求，1955年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作出決定，允許蘇聯朝鮮公民取得朝鮮國籍或雙重國籍<sup>①7</sup>。這項工作順利開展以後，金又明確告訴蘇聯大使，年輕人可以擁有雙重國籍，但「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領導幹部應該有朝鮮國籍」，這才是「問題重要意義的所在」。「至於那些犯了錯誤受到處分的蘇籍朝鮮公民，他們最好留下來，在實際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sup>①8</sup>。很顯然，只要這些幹部、特別是處於領導地位的幹部有了朝鮮國籍，金就可以放心了<sup>①9</sup>。

對於勞動黨開展的對蘇籍朝鮮幹部的批判和處分，莫斯科雖有一些看法，但是基本上採取了容忍和溫和的態度。檔案文獻顯示，儘管蘇聯使館和外交部認為，勞動黨對朴昌玉、朴永彬等人所犯錯誤的指責「明顯有些誇大其詞」，企圖把他們的錯誤與許嘉誼的問題聯繫起來，「令人懷疑」，在地方上對待蘇籍朝鮮公民也有「過火行為」，甚至「出現了沙文主義傾向」，但基本看法還是承認這些幹部犯有錯誤，勞動黨對他們做出的組織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sup>②0</sup>。在蘇籍朝鮮公民返回蘇聯的問題上，蘇共中央根據國際部的意見指示駐朝使館，處理這一問題的原則是：「犯有錯誤的人不得藉口返回蘇聯逃避責任。這些人應該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當地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取得人民的信任。」<sup>②1</sup>筆者查閱大量俄國檔案後形成的看法與俄羅斯著名朝鮮問題專家蘭科夫 (Andrei Lankov) 的看法一樣，即在大多數情況下，蘇聯官員面對前來反映情況或訴苦的蘇籍朝鮮幹部，只會作為被動的聽眾，盡量避免發表意見或提出建議，特別是絕對不在那些政治敏感的問題上表明態度<sup>②2</sup>。究其原因，固然與使館官員的謹慎處事原則有關，但主要問題恐怕還在於蘇聯既定的政策、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與蘇朝關係相比，中朝關係的狀況很不相同。目前可以看到的檔案文獻表明，朝鮮領導人與蘇聯使館聯繫密切，經常匯報工作和聽取意見，但卻很少造訪中國使館。蘇聯使館對朝鮮問題雖然採取不干預的方針，但對基本情況都瞭如指掌，且有自己的看法，而中國使館卻顯得漠不關心，而且毫不知情。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中朝關係有些「不正常現象」。如「志願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裏」；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十二個戰績展廳中只留一個給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而在其餘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呆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sup>②3</sup>。

在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中，完全看不到使館官員與朝鮮幹部談論朝鮮內部事務的記錄。當然，也有可能這方面的文件尚未解密。不過，即使有也不會很多。據中國駐朝使館的例行報告，自朝鮮戰爭結束以後，朝鮮黨政軍各機構紛紛來使館聯繫的情況已經沒有了。在一般外交禮儀上，中國官員享受的待遇與蘇聯相同，「比較特殊」，但就雙方接觸而言，都是正常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業務，「朝方大的、急迫的要求不多」。以至於使館在制訂1956年的交際工作計劃時特別提到，要「爭取多認識〔內閣〕相以上的幹部」<sup>②4</sup>。從中國方面

來說，對朝鮮的內部事務似乎也沒有放在心上。例如，接近兩年的時間中國駐朝使館竟沒有派駐大使：倪志亮 1952 年 3 月離任，直到 1955 年 1 月中國政府才任命潘自力為新大使<sup>⑤</sup>。中國使館官員辦事死板保守，工作欠缺主動性，調研工作「有名無實」，對朝鮮的整個情況缺乏了解，不能滿足國內的「基本需要」，有些大事使館人員甚至是看了《人民日報》才知道<sup>⑥</sup>。這裏的問題當然不在於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缺少外交經驗，遇事退避三舍，恐怕還是中國政府出於不干預朝鮮內政的基本立場而表現出來的冷淡。蘇聯副外長庫爾久科夫 (И. Ф. Курдюков) 注意到，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他認為，「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儘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但他們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sup>⑦</sup>蘇聯人的觀察很準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總之，朝鮮戰爭結束以來，對於朝鮮的內部事務，蘇聯不干預，中國不關心，這是金日成能夠在短短幾年內逐個擊敗政治對手，掃除黨內各派勢力，將黨政軍大權攬於一身的外部因素。通過把南方派打成反黨叛國間諜集團，撤銷延安派主要幹部的領導職務，開展對蘇聯派的大批判運動，到 1956 年初，金日成已經基本做到大權獨攬。而在全黨提出確立「主體」思想，使金日成搶佔了意識形態制高點，由此不僅掌握了擊敗政治對手的思想工具，而且也為日後建立自己的思想和路線體系打下了理論基礎。然而，金並非從此就踏上了政治坦途。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後，在他通向權力頂峰的道路上又出現了新的波折。

## 註釋

①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參見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首爾：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首爾：極東問題研究所，1974）；林隱：《金日成正傳》（首爾：沃村文化社，1989）；韓國日報社編：《關於金日成的證言——俞成哲、李相朝所揭示的北韓政權實體》（首爾：韓國日報社出版局，1991）；《中央日報》特別採訪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秘錄》，上、下卷（首爾：中央日報社，1992、1993）；金學俊：《北韓五十年》（首爾：斗山東亞出版社，1995）；李鍾奭：《朝鮮勞動黨研究》（首爾：歷史批評出版社，1997）；黃長燁：《我所看見的歷史真理——黃長燁回憶錄》（首爾：宇宙出版社，1999）。

③ 參見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 Balá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下斗米伸夫：《莫斯科與金日成——冷戰中的北朝鮮（1945-1961）》（東京：岩波書店，2006），此書有俄文譯本。

④ 中國著名的中朝關係史專家楊昭全在香港出版的三卷本《金日成傳》（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2010）大概是該領域唯一一本中文著作，其中使用了大量中文

檔案文獻。但遺憾的是關於 1950 年代這段歷史的敘述，運用的史料既不充分，也不規範。

⑤ 由於篇幅限制，〈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按時間順序分為五個專題：「在黨內排除異己」；「八月事件」；「應對中蘇共同干預」；「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志願軍撤離北朝鮮」。五篇文章陸續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上發表。

⑥ 關於朝鮮勞動黨組建及蘇聯移交權力的詳細過程，參見沈志華：〈蘇聯與北朝鮮政權的建構（1945-1949）〉，《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22-32。

⑦ 關於朝鮮勞動黨內各派的由來，參見沈志華：〈試論八十八旅與中蘇朝三角關係——抗日戰爭期間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4-16；〈蘇聯與北朝鮮政權的建構（1945-1949）〉，頁 22-32。不過，這裏需要聲明，勞動黨內這些派別的劃分和稱呼，都是研究者的習慣用語，筆者借用這些稱呼只是為了行文方便。實際上，如果從是否有組織活動的角度看，除了南方派以外，所謂「延安派」、「蘇聯派」都稱不上是一個「派別」，他們基本上都是個人行為，與原來朝鮮共產黨內各派開展有組織活動的情況完全不同，與南方派的組成也有很大差別。延安派雖以 1956 年「八月事件」而為人熟知，但其實參與者並非都是來自中國的朝鮮幹部。

⑧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致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電，1949 年 10 月 4 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ПРФ），ф.43, оп.1, д.346, л.59。

⑨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電，1950 年 9 月 21 日，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АМО РФ），ф.5, оп.918795, д.125, л.86-88。

⑩ 金日成：〈在平壤市慶祝八·一五解放六周年大會上的報告〉（1951 年 8 月 14 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1），頁 376-80。

⑪⑬ 金學俊著，張英譯：《朝鮮五十七年史》（2005），未刊，頁 214-15；216。

⑫ 參見沈志華：〈試論朝鮮戰爭期間的中朝同盟關係〉，《歷史教學問題》，2012 年第 1 期，頁 4-16。

⑭ 金日成：〈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鞏固是我們勝利的基礎〉（1952 年 12 月 15 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七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1），頁 358-61。後來出版的《朝鮮勞動黨簡史》證明，這些話就是針對朴憲永講的。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所編：《朝鮮勞動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359。

⑮ 《北韓全書》，上卷，頁 259。

⑯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30-34.

⑰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編：《朝鮮勞動黨歷屆中央全會概況》（1981），未刊，頁 12-14。

⑱⑳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朝鮮革命資料》，第二輯（1951），未刊，頁 46-48。

㉑㉒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 年 9 月 18 日，未刊。

㉓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34-36. 關於審判朴憲永的詳細經過和文件，參見金南植、沈之淵編著：《朴憲永路線批判》（首爾：圖書世界出版社，1986），頁 459-535。

㉔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8-30；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 216-21。

㉕㉖ 彼得羅夫（А. М. Петров）給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的報告，1956 年 3 月 17 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ф.5446, оп.98, д.721, л.203-204。

㉗ 參見沈志華：〈蘇聯與北朝鮮政權的建構（1945-1949）〉，頁 22-32。

㉘ 參見沈志華：〈同命相連：朝鮮共產黨人融入中共的歷史過程（1919-1936）〉，《社會科學戰線》，2015 年第 2 期，頁 68-85。

㉙ 金日成：〈目前形勢和當前任務〉（1950 年 12 月 21 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頁 169-71；《朝鮮革命資料》，第二輯，頁 46-48。在中文版著作集中，點名批評武亭的內容被刪除了。這部分內容可以在早期出版的朝文本中看到。

- 參見金日成：〈目前形勢和當前任務〉（1950年12月21日），載《金日成選集》，第三卷（平壤：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54），頁139-40。
- ⑳ 《朝鮮革命資料》，第二輯，頁46-48；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2-23；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201。
- ㉑ 《中央日報》特別採訪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秘錄》，上卷，頁147；《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第八冊（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頁353；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7日。金忠植1956年8月逃亡中國前任勞動黨平壤市組織部部長。
- ㉒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金日成規定朝鮮幹部不得私下與中國人接觸。因為朴一禹經常向志願軍通報情況，徐輝與負責停戰談判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過從甚密，金日成曾大發雷霆。筆者採訪柴成文記錄，北京，2000年9月12日；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
- ㉓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3, 2009, с.124；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冷戰國際史研究》，第七輯（2008年冬季號），頁268；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269。
- ㉔ 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213；李鍾奭：《北韓—中國關係（1945-2000）》（首爾：圖書出版中心，2000），頁200。
- ㉕ 彼得羅夫與朴·伊拉里翁·德米特里耶維奇（Пак Илларион Дмитриевич，蘇籍朝鮮人，朴是姓氏）談話紀要，1955年3月31日，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РГАНИ，以下簡稱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314, л.192。
- ㉖ 金日成：〈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鞏固是我們勝利的基礎〉，頁355-56。後來金日成點名批判朴一禹，使用的就是「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詞。參見金日成：〈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現階段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1955年4月4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九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2），頁251-53。
- ㉗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頁394。
- ㉘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後來朴一禹的罪名之一就是「裏通外國」。
- ㉙ 金日成：〈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現階段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頁247-54；彼得羅夫與朴·伊拉里翁·德米特里耶維奇談話紀要，1955年4月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314, л.197。
- ㉚ 彼得羅夫·比亞科夫（И. С. Бяков）與宋晉發談話紀要，1955年4月6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314, л.202-203；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35-36。
- ㉛ 朝鮮勞動黨十二月中央全會關於朴一禹反黨活動的決議，1955年12月3日，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5446, оп.98, д.721, л.205-10；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十二月全會的講話，1955年12月3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1, л.22-42。
- ㉜ 參見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記，1956年5月18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173-75。
- ㉝ 《北韓總覽（1945-1968）》，頁173-74。
- ㉞ 金日成：〈關於黨組織在組織工作中的幾個缺點〉（1951年11月1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六卷，頁415-21；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212-13；李鍾奭：《北韓—中國關係（1945-2000）》，頁200；《北韓總覽（1945-1968）》，頁173-74；Dae-sook Suh, *Kim Il Sung*, 124-25。
- ㉟ 《朝鮮勞動黨歷屆中央全會概況》，頁12-14。關於許嘉誼的死因，目前還有很大爭論。事實上，許多人相信許嘉誼是被暗殺的。參見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7；李鍾奭：《北韓—中國關係（1945-2000）》，頁200；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213。但筆者以為，許嘉誼既已失勢，又無組織活動，從邏輯上講似乎沒有必要再組織對他的暗殺。



- ④⑤ Ланьков А. 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сток*, 2003, No.1, с.112.
- ④⑥ 《朝鮮勞動黨歷屆中央全會概況》，頁12-16；〈朝鮮勞動黨中央三月全會 通過關於組織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54年3月27日，第4版。
- ④⑦ 參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根據俄國最近披露的檔案文獻〉，《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2004年冬季號），頁28-70。
- ④⑧ 彼得羅夫、比亞科夫與宋晉發談話紀要，1955年4月6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314, л.200-207；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3月12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73-85；伊萬諾夫日記，1955年12月7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6-20；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75-83。
- ④⑨ 伊萬諾夫日記，1955年12月29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102-103；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
- ④⑩ 魯緬采夫(С. Румянцев)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57-67；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月2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122-26。
- ④⑪ 菲拉托夫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3月12日。
- ④⑫ 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с.125-28。
- ④⑬ 「運動」這一說法，參見魯緬采夫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 ④⑭ 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十二月全會的講話，1955年12月3日；薩姆索諾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關於朝鮮勞動黨中央十二月全會的報告，1956年1月4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1, л.14-19；《朝鮮勞動黨歷屆中央全會概況》，頁18-19；伊萬諾夫日記，1955年12月4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3-6。
- ④⑮ 伊萬諾夫日記，1955年12月20、22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94-99。
- ④⑯ 伊萬諾夫日記，1955年12月29日；菲拉托夫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3月12日；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薩姆索諾夫關於朝鮮勞動黨中央十二月全會的報告，1956年1月4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1, л.18-19。
- ④⑰ 菲拉托夫與朴永彬談話紀要，1956年2月25日；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3月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128-32；菲拉托夫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3月12日。
- ④⑱ 比亞科夫與鄭律談話紀要，1956年4月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126-28。
- ④⑲ 《勞動新聞》，1952年4月15日特刊。參見冰蔚等譯：《金日成將軍傳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2）。中譯本註明譯自1952年4月10日《勞動新聞》特刊，有誤。實際上，1952年4月10日《勞動新聞》只是發表了有關刊出《傳略》的消息，而全文是在4月15日作為特刊發表的。
- ④⑳ 詳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312-01、117-00312-03、117-00312-04等卷宗。
- ㉑ 金學俊：《朝鮮五十七年史》，頁215-16；比亞科夫與鄭律談話紀要，1956年4月5日。
- ㉒ 魯緬采夫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薩姆索諾夫與奇石福談話紀要，1956年5月31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199-223。
- ㉓ 李相朝給朝鮮勞動黨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233-95；魯緬采夫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 ㉔ 由於該文的副標題是「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人員的講話」，很多研究者認為這是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如*Син Се 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гг.*, с.128-29）。但是仔細查閱原文，金日成講

到他的聽眾都參加了「昨天的會議」，而朴昌玉對蘇聯使館說，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在27至29日召開，參加者超過四百人（菲拉托夫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3月12日）。由此可以判斷，這個講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發表的。

⑤②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40-41; 20-21.

⑤③ 〈在朝鮮勞動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擴大全會上 金日成同志作關於蘇共二十二大的報告〉，《人民日報》，1961年12月1日，第3版。

⑤④ 參見〈朝《勞動新聞》紀念勞動黨二屆五中全會十周年〉，《人民日報》，1963年1月3日，第4版。黃長燁回憶了他在1961年與金日成討論「主體」思想的經過。參見黃長燁：《我所看見的歷史真理》，頁133-40。

⑤⑤ 參見沈志華：《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и др.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248-300；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東北日報》，1948年11月8日，第1版。

⑤⑥ 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19-43。

⑤⑦ 詳見卡德爾(Edvard Kardelj)著，李代軍等譯：《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60-62；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297。

⑤⑧ 金日成：〈關於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確立主體〉（1955年12月28日），載《金日成著作集》，第九卷，頁397-407；407-408。

⑤⑨ 菲拉托夫與朴義琬談話紀要，1956年1月24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66-69。

⑤⑩ 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到1956年初，共有196名蘇籍朝鮮人在朝鮮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工作。參見魯緬采夫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⑤⑪ 菲拉托夫與朴義琬談話紀要，1956年1月24日、2月21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66-77；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3月5日。

⑤⑫ 維諾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和謝爾巴科夫(Л. А. Шербаков)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2月2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63-65。

⑤⑬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月13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109-16。

⑤⑭ 截至1956年4月，向蘇聯使館提出申請退出蘇聯國籍的共有96人（外加其家屬95人），表示希望擁有雙重國籍的有27人。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0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117-18。

⑤⑮ 薩姆索諾夫關於朝鮮勞動黨中央十二月全會的報告，1956年1月4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1, л.14-21；魯緬采夫關於朝鮮勞動黨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

⑤⑯ 庫爾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致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函，1955年4月7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314, л.48-50；另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月27至29日，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2, л.126-27。關於戰爭紀念館的說法是真實的，筆者2006年到平壤參觀時專門去看過，情況依然如此。

⑤⑰ 駐朝使館1954年工作總結，1955年1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8-00524-05，頁62-68；駐朝使館1956年交際工作計劃，1956年3月2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479-03，頁10-12。

⑤⑱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497。

⑤⑲ 駐朝使館1954年工作總結，頁62-68；駐朝使館1954年交際工作總結，1955年3月2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0372-01，頁3-5。

⑤⑳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